

阿拉伯发展问题

伊拉克战后政治发展的三个纬度

丁 隆 郭雅娟

摘 要: 伊拉克在战后启动了国家构建进程,建立了民主制度。然而,超越了伊拉克民族构建阶段的民主化进程,不利于民主化进程顺利发展,不但引发了教派冲突,而且对民族构建带来负面影响。只有推动民族构建进程,才能消除教派冲突的根源,使国家构建顺利开展,从而推动民主制度在伊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伊拉克; 国家构建; 民族构建; 中东民主化

作者简介: 丁隆, 硕士,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阿语系副教授(北京 100029);

郭雅娟,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阿拉伯语系 2006 级硕士生(北京 100029)。

文章编号: 1673-5161(2008)05-0020-07

中图分类号: D371

文献标识码: A

伊拉克战争结束后,在美国主导下,伊开启了政治重建进程,通过民主选举,建立了民选政府和议会,并拥有了一部永久宪法。与此同时,伊拉克安全局势持续恶化。2006年初以来,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之间爆发严重冲突,族群和教派矛盾为伊拉克安全局势和战后重建带来巨大挑战。本文通过评估伊拉克国家构建、民族构建与民主化进程,分析三者间互动关系,解读伊战后政治发展状况。

一、民族构建、国家构建和民主化的定义

研究伊拉克民族构建、国家构建与民主化进程的关系,首先需明确三者的定义。民族构建(nation-building)是指民族作为文化—政治共同体的构建过程和民族认同的形成过程。^[1]与民族构建有密切联系的另一个概念是国家构建(state-building),是指在强化现有国家制度的同时,建立新的国家和政府制度,侧重于官僚体制的建立,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形成。民族国家作为“典型的正常的国家形式”^{[2] 264},具有“民族”和“国家”的双重特征。因此,“民族国家构建”(nation-state building)是民族与国家构建的双重进程。从上述三个概念可以看出,民族构建涉及文化—政治共同体和民族认同的形成,文化和认同变化的缓慢决定民族构建进程的长期性。与民族构建相比,国家构建仅涉及国家制度和官僚制度的建立,因而历时较短。由于民族构建需要在民族国家框架内进行,国家构建一般先于民族构建,二者又是同一进程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学界对民主的定义较多,其中较有影响的是约瑟夫·熊彼特的观点,认为,“民主是一种政治方法,即为达到政治——立法与行政的——决定而做出的某种形式的制度安排”^{[3] 358}。熊彼特的

民主理论侧重于程序民主，即通过竞争性选举产生治理者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个人获得了参政的自由和权利。民主的核心价值是主权在民，民众参与国家治理，是一种与君权神授对立的世俗政治制度。民主化则指政治制度从威权主义向有限民主，再到民主过渡的进程。大卫·波特认为，“民主化是指这样一种政治变革过程，即由较少负责的政府到较多负责的政府；由较少竞争（或纯粹没有竞争）的选举到较为自由和公正的竞争性选举；由严厉限制人权和政治权利到较好地保障这些权利；由市民社会只有微弱的自治团体（或纯粹没有）到享有充分自治和数量较多的自治团体。”^{[4] 6}

二、伊拉克国家构建进程评析

国家构建是指国家从地理上的割裂和治理上的分散状态到统一民族国家的建设与整合。弗朗西斯·福山指出，“国家构建的主要内容是建立或强化国家机构。”^{[5]ix} 战后，在美国主导下，伊拉克建立了中央政府和议会，并颁布了永久宪法，军队和警察部队逐渐壮大。伊拉克国家机器和官僚体制虽初步建立，但仍存在诸多问题。如政府和议会按民族和教派人口比例组成，军队国家化尚未完成，军警系统被教派武装渗透，北部库尔德人地区仍处在事实上的独立状态等。

美国兰德公司学者詹姆斯·多宾斯为国家构建设定了六项主要任务和评估指标，包括安全、人道主义救济、政府治理、经济稳定、民主化和发展。^{[6]xxiii} 我们可以借助这些指标评估伊拉克国家构建水平。

1.安全局势。战后伊拉克安全局势在经历短暂的相对稳定后，自2004年起伊反美武装开始发动针对美军的游击战，伊斯兰极端主义者频繁制造恐怖袭击，伊拉克局势陷入动荡。2006年初，阿里·哈迪清真寺遭袭后，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之间爆发教派冲突，伊安全局势不断恶化。除教派之间的冲突外，什叶派内部也存在派别矛盾，如萨德尔派的迈赫迪军和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的巴德尔旅之间时常发生冲突。截至2008年3月，已有66万余名伊拉克人死亡，其中平民占99%。另有4000余名美军士兵在伊拉克阵亡。^[7] 2007年初，美国采取了向伊拉克增兵等措施，以改善伊安全局势。2008年以来，这些措施的效果开始显现，伊安全局势得到显著改观。然而，在教派分裂等诸多因素影响下，伊拉克全面恢复稳定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2.人道主义救济。截至2006年底，教派冲突已使160万人背井离乡，180万人逃往国外。^[8] 大规模人员迁徙造成了人道主义灾难。目前，伊拉克政府尚无力完成改善民生，救济难民的工作。由于政府不能提供足够的公共物品，部落、教派势力便代替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使宗派主义得到强化。此外，恶劣的安全状况使国际人道主义援助不能如期到位。

3.政府治理。伊拉克已经成立有广泛代表性的政府，并拥有了宪法，但伊政府组成建立在教派分权基础上，政府主要官员经常不顾国家利益，为各自教派谋利。当前，伊政府面临诸多挑战。民族和解方面包括促成各派达成政治协议、确定石油收入分配方式、举行省级选举、决定基尔库克地位、实行大赦等；安全方面包括取缔民兵，减少巴格达及其周边地区的暴力活动；治理方面包括提供公共物品和基本服务，遏制腐败等。

4.经济稳定。由于油价上涨，伊拉克经济状况虽略有改善，但仍不容乐观。2006年伊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仅为4%，与伊政府制定的10%的目标相去甚远。通货膨胀率超过50%，失业率在20~60%之间，外国直接投资不足国内生产总值的1%。^{[9]23} 伊拉克经济严重依赖石油，石油收入占伊国内生产总值的70%和财政收入的95%。恶劣的安全状况影响了石油生产，2008年二季度伊石油平均日产量约240万桶，不仅低于战前水平，也未达到伊政府制订的日产量250万桶的目标。^[10] 此外，伊石油资源归属不明晰，石油收入分配方式尚未理顺，伊国内各民族和教派势力均激烈争夺石油资源。

5.民主化。战后，伊采用按民族和教派人口比例分权的“黎巴嫩模式”，组建了政府和议会。从权力分配上看，这种“马赛克式民主”兼顾各族群、派别的利益，然而，这一模式反而强化了种族、教派意识，使种族、教派利益直接转化为政治利益，可能导致族群分裂的状况制度化、永久化，显然不利于健全民主制度。

福山认为，“国家构建有三个区别明显阶段：第一阶段是战后重建，适用于从暴力冲突中走出来的国家，如阿富汗、索马里等。它们的国家权力已经全部崩溃，需要从基础开始重建；第二阶段的主要目标是在外国干预撤离后，建立自我维持的国家制度。第二阶段比第一阶段困难，但至关重要；第三阶段的主要任务与第二阶段部分重合，主要是强化弱国家的力量。”^{[5]100}根据福山对国家构建进程的划分，伊拉克目前处在国家构建的第一个阶段。受民族构建状况的制约，虽然伊完成了国家构建第一阶段的部分任务，但完成第一阶段的任务，并向第二阶段过渡尚需时日。

三、伊拉克民族构建进程评析

从文化和政治认同角度看，伊拉克民族构建进程起点低，水平不高，社会缺乏同质性，教派、民族和部落等次国家单位使国家和民族认同弱化。纵向看，现代伊拉克国家虽已有80余年历史，但仍带有许多前现代特征；横向看，国家被族群、教派碎片化，民族认同模糊甚至错位，公民对次国家组织的认同取代了对国家的认同，使国家向心力不足。从政权性质看，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权模式相似，复兴党通过政变上台，先天缺乏政治合法性和稳定性。为巩固统治，复兴党政权收紧政治参与，用高压政策甚至暴力手段维护政权稳定。统治阶层在血亲、部落和教派等先天认同基础上建立，并吸收部分技术官僚，组成军人—文官统治联盟。在威权统治下，伊拉克拥有了庞大的官僚体系，而公民社会却失去发展环境。官僚—威权主义政权的性质决定复兴党政权不能理顺与社会和公民的关系。外部生成的石油租金使政府扮演公民“供养者”和财富分配者的角色，而无需接受公民的监督，为政府“独立”于民众提供了条件，导致利益寻租和庇护主义的产生和权威主义的再生产。阻碍伊拉克民族构建的主要因素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历史因素。伊拉克民族构建的困难与其现代国家形成背景密不可分，现代伊拉克国家是殖民主义留给中东的“负资产”，也是伊拉克目前民族构建困难和教派矛盾激化的根源。现代伊拉克国家及其版图在一战后最终形成，作为殖民主义遗产的“人造国家”^①，伊拉克民族构建先天不足。基辛格认为，“伊拉克不是一个历史意义上的国家。”^[11]伊拉克北部为库尔德人居住区，中部为逊尼派穆斯林居住区，而南部为什叶派穆斯林居住区。这使伊拉克宗教、民族构成复杂，居住地的相对隔绝不利于民族和教派之间的融合，进而阻碍了民族构建的正常进行。

2.意识形态因素。伴随着上世纪中叶阿拉伯世界民族国家体系的建立，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成为阿拉伯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在纳赛尔的影响下，统一阿拉伯世界，恢复阿拉伯帝国昔日辉煌的梦想，不仅影响了萨达姆、卡扎菲等一代阿拉伯国家领导人，民众亦对阿拉伯共同事业抱有幻想。在纳赛尔主义的兴盛时期，作为殖民主义产物的现存阿拉伯国家只是一种过渡形式，在政治话语中被矮化为“内部国家”(al-dawlah al-qutriyya)，这种国家形式最终将被“阿拉伯祖国”(al-watan al-arabi)取代。早日建立“阿拉伯祖国”的使命肩负着挫败殖民主义阴谋和实现阿拉伯民族复兴的双重使命。在阿拉伯世界，现存的民族国家是一种原罪。时至今日，如果一个阿拉伯国家过多关注本国利益，置阿拉伯民族整体利益于不顾，会遭到民众和媒体的批评。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

^①一些伊拉克学者不同意西方学者的观点，认为“伊拉克”作为地名古已有之。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巴士拉和摩苏尔在行政上隶属于巴格达。复兴党上台前，伊拉克民族认同已初步形成。因此，伊拉克不是“人造国家”。参见 Feisal Amin Rasoul Al-Istrabadi, “Rebuilding a Nation: Myths, Realities, and Solutions in Iraq,”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 Vol. 29, No. 1, Spring 2007.

系也有别于一般的国家间关系，它有时是正常的国家间关系，有时又像“阿拉伯大家庭”里的兄弟关系。因此，阿拉伯世界的民族国家体系是一个“准民族国家体系”。现代民族构建以民族国家为基础，在泛阿拉伯主义背景下开启的阿拉伯国家民族构建进程必然遭受挫折。

对于效仿埃及革命建立起来的伊拉克复兴党政权，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是方便的政治合法性依据。因为，在宗教、语言、文化一致的阿拉伯世界，建立统一的“阿拉伯祖国”具有天然的政治正确性。复兴党政权可以在“民族国家”、“内部国家”和“阿拉伯祖国”等概念之间游刃有余，为自身政策和行为找到依据。它既可以为“捍卫阿拉伯民族利益”、“抵御波斯人入侵”与伊朗作战，又可以为“捍卫国家利益”，无视民族国家间的边境，出兵占领科威特。意识形态的混乱使伊拉克民族构建失去了方向。虽然复兴党政权在实践中仍采取民族主义政策，但至少在复兴党的宣传和政治话语中，作为“内部国家”的伊拉克不是最高政治认同和终极目标，这无疑给伊民族构建带来负面影响。

3. 社会因素。由于伊拉克国家发育不成熟，是典型的“补丁国家”(patchwork state)。社会被民族和宗教派别等次国家组织碎片化，政权的合法性和稳定性不足。复兴党政权依靠传统社会组织，如家族、部落、宗教派别等维持统治，这使伊拉克民族构建陷入恶性循环。虽然复兴党政权奉行世俗主义，但其政策并没有超越民族和教派，其前现代属性被民族主义话语所掩盖。1979年，萨达姆在接受采访时称，“我们不相信通过宗教能够处理生活是因为这不可能为阿拉伯民族服务。它只会把这个民族分裂成不同的宗教、无数的教派和思想派别。”^{[12] 294}事实上，萨达姆仍依靠教派和部落等原生态组织维持统治，其政权的核心成员多为其亲属和其所属的艾布·纳赛尔部落，以及提克里特地区的其他逊尼派部落。^{[13] 34}这使复兴党政权成为典型的“苏丹式政权”(sultanistic regime)。由于逊尼派人口数量较少，复兴党为巩固政权，对库尔德人和什叶派采取高压政策，多次镇压库尔德人和什叶派起义，使伊拉克族群矛盾不断激化。库尔德人试图在伊拉克北部建立独立国家，什叶派穆斯林则试图在伊拉克南部建立以巴士拉为首府的什叶派自治区，进而建立独立的“什叶斯坦”。复兴党政权狭隘的教派——部落属性和错误的宗教民族政策强化了库尔德人独立倾向和什叶派分离主义，阻碍了民族构建进程。

4. 宗教因素。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影响相似，宗教也是妨碍阿拉伯国家界定民族认同的重要因素。阿拉伯民族主义陷入低潮后，泛伊斯兰主义思潮在阿拉伯国家显著抬头。在伊斯兰主义者的政治话语中，现存的民族国家和世俗政权不符合伊斯兰教教义，合乎伊斯兰教教义的国家形式是伊斯兰教初创时期的“乌玛”，它将结束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被分割为若干民族国家的状况，实现伊斯兰世界的统一和复兴。乌玛观念使现代民族国家的宗教合法性遭到质疑，许多伊斯兰主义者主张取消不合法的现代伊斯兰国家，建立“哈里发国家”。

尽管复兴党政权长期遏制泛伊斯兰主义，特别是什叶派伊斯兰主义，但由于伊拉克是什叶派诞生地，该派主要圣地均在其境内，什叶派伊斯兰主义在伊仍具有较大影响。伊斯兰达瓦党和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等什叶派伊斯兰主义政党在战后上台执政，其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和教派色彩成为伊民族构建的不利因素。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自现代伊拉克国家建立以来，民族构建进程受到诸多负面因素制约，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民族认同和文化——政治共同体远未形成。同时，被威权统治掩盖的民族和教派矛盾又在战后集中爆发，使民族构建向其反面——民族解构发展。

四、伊拉克民族构建对民主化进程的影响

通过对伊拉克民族构建进程的回顾与解析，可以看出其民主化进程与民族构建相互脱节，超越了民族构建和社会整合的必要阶段。伊拉克民族构建对民主化进程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1.文化认同阻碍民主化进程。民族构建是指民族作为文化—政治共同体的构建过程和民族认同的形成过程,伊拉克显然没有完成民族构建过程。从表面上看,伊拉克并不缺乏领土、主权、政府、人口等一个国家应具备的基本条件。然而,由于历史、宗教等因素的制约,伊又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在民族和社会整合不成熟的情况下,出现了文化认同上的难题。相对国家认同而言,伊拉克国民更忠诚于自身所属的种族与教派。基辛格指出,“民主的发展一般需要经历一个民族构建的阶段。正是企图超越这一阶段,才使我们在伊拉克正确的目标被扭曲成今天的局面。”^[11]在正常情况下,民主政治、多元竞争以及政党力量组合的标准应该是基于观点、利益等后天性分歧,而不是先天性的教派和种族差别。对于种族、教派的亚文化认同强于国家认同使得伊拉克目前的民主制度中带有政治分裂倾向,不利于民主化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民主制度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罗伯特·达尔指出,“一般来说,文化同质性的国家更有可能发展和延续民主政体,而一个国家如果存在严重分化与相互冲突的亚文化,这种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14] 158}罗斯托概括了所有国家民主化过程的普遍道路,认为“民主化过程包括四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是民族统一的建立,大多数人在政治上开始产生民族认同。”^{[15] 350-351}

2.特殊信任阻碍民主化进程。艾里克·M.乌斯拉纳认为信任可以分为“普遍信任”与“特殊信任”,普遍信任盛行于民主社会,而特殊信任在威权和极权社会更为典型。^{[16] 114}“特殊信任起抵消普遍信任影响的作用,对人们的普遍信任导致我们参加广泛多样的集体行动,而特殊信任通常导致人们脱离公民生活。”^{[16] 121}由于历史、文化原因,伊拉克内部种族、教派矛盾重重,长期处于分裂局面,伊拉克民众更倾向于“特殊信任”——对本民族和教派的信任,同时不信任甚至仇视其他民族与派别。在这个意义上,战后伊拉克大选与其说是民主选举,不如将其视作一场基于种族、派别人口数量的较量。福山对此有不同的解读,并指出,“一些参加2005年各种选举的伊拉克什叶派穆斯林,不是在追求自由民主,而是什叶派的权力。他们企图在什叶派控制的地区建立伊朗式的伊斯兰共和国。”^{[17] 30}成熟的民主选举是政党之间围绕政治理念和政绩展开的竞争,民主的魅力在于权力和平更替。如果某个民族或教派依靠人口优势毫无悬念地赢得每一次选举,而人口处于劣势的民族和教派永无出头之日,那么这种建立在特殊信任基础上的民主显然被异化了。

五、伊拉克民主化进程对民族构建的影响

战后,伊拉克采用按民族和教派人口比例分权的“黎巴嫩模式”组建了政府和议会,总统为库尔德人,总理为什叶派穆斯林,议长为逊尼派穆斯林,各部部长和议员也基本按照民族和教派比例分配。这种权力分配模式与建立在社会充分整合基础上的民主有本质区别,它强化了种族、教派意识,也为教派冲突埋下种子。近年来黎巴嫩民主遭遇的困境也证明,建立在分权基础上的民主并无可持续性作保障。这种看似公平的分权民主,实际上是占人口多数的什叶派当政。由于政府和议会均被什叶派掌控,其他民族和教派,特别是战前一直执政的逊尼派,在政治生活中被边缘化。由什叶派主导的伊拉克政府不仅被逊尼派穆斯林视为教派政府,一些逊尼派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也质疑其代表性。国际危机小组的中东问题专家指出,“伊拉克政府和安全部队是伊国内冲突中的其中一方。”^{[18] 1}民主化和民族构建这两个相互促进的进程,在战后伊拉克国家构建进程中却成为相互制约的关系,本应在民主化进程中升华的伊拉克民族构建,呈弱化甚至解构的态势。与国家构建进程进入成熟阶段的国家不同,在伊拉克这样的被教派、民族和部落等原生态社会单元碎片化的国家,选举不仅不能自然地产生政治合法性,还破坏了伊拉克持续千年的政治生

态，失意的逊尼派穆斯林对政治现实发起的挑战甚至还引发了教派冲突。

冷战后，美国频繁参与战后国家构建，在索马里、阿富汗、伊拉克等国开展政治重建。多宾斯指出，“在现代国家构建方面，没有哪个国家比美国更有经验。”^{[6] iii}然而，美国主导的战后国家构建却屡遭挫折，其原因是美国无视这些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政治文化特质和民族构建阶段，把民主当作万能药方，企图用美式民主包治这些国家的所有顽疾。美国尤其对伊拉克民族构建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估计不足，把伊国家构建和民族构建等量齐观，认为伊战后面临的政治重建任务和二战后的德国、日本一样，是一个国家构建进程。事实上，当时的日本和德国不需要进行民族构建和社会整合，它们的民族构建已经成熟，完全具备民主化的条件，需要完成的只是国家构建。而伊拉克却面临国家构建和民族构建的双重任务，而且后者更为艰巨。基辛格指出，“伊拉克不是日本，也不是德国。当年这两个国家进行战后民主改造时，除最高层的10%外，政府基本上没有改变。当时这两个国家也不存在安全问题。”^[19]曾经支持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福山，也不断反思美在伊拉克推广民主的正确性，认为，“经济和社会现代化有一个普遍的进程，你只能在社会的边缘引导和加速事物的发展。”^[20]目前，伊拉克尚不具备有利于民主发育的经济模式、自信的中产阶级、强大的公民社会和充分的个人自由等民主化的必要条件，这些内生性因素在社会自然演进过程中逐步形成，而非外力可以创造。美国学者迈克尔·曼德鲍姆指出，“建立人民主权相对容易，而民主的另一要素——自由则难以保障。”^[21]刚刚摆脱威权统治的伊拉克。依赖石油收入的地租经济模式、复杂的社会结构和易于诱发威权的传统政治文化，均不利于制度化民主在伊拉克扎根，也决定了伊民主化进程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六、结语

成熟的民族构建是民主化的必要条件，符合民族构建阶段的民主制度又可以促进民族认同和社会同质性的强化，推动民族构建的纵深发展。伊拉克现代国家形成的背景、意识形态、宗教和社会等因素阻碍了民族构建进程，使社会被教派、民族等原生态组织分割，亚文化认同取代了国家认同。

由于伊拉克民主化超越了民族构建阶段，亚文化认同和特殊信任扭曲了民主。在不利于民主化的经济模式和政治文化影响下，伊民主化进程陷入困境。不但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还成为教派冲突和民族解构的诱因。草率的民主化和急剧的政治转型使伊处于权力失衡状态，由战前的逊尼派专政演变为目前的什叶派专政，权力失衡引发的教派冲突使伊拉克回到“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自然状态，政治进程演变为一场零和游戏，对民族构建和国家构建带来消极影响。

当前，美国政府应意识到伊拉克国内冲突并非单纯的治安问题，其根源是民族构建和民主化之间的矛盾，仅靠军事手段无法结束伊拉克乱局。因此，美国应帮助伊完成国家构建任务，运用政治手段消除族群矛盾的根源，并优化民主制度设计，使其成为促进民族构建的积极因素，从而防止民族解构态势进一步发展。美国还须认识到，人为解构伊拉克的方法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伊拉克问题，还将造成伊国内冲突的外溢，给地区乃至国际安全带来威胁。只有在民族和解和民族认同基础上，超越泛阿拉伯主义、伊斯兰主义、亚文化认同等历史遗产和意识形态纠葛，使伊拉克民族构建重新走上正轨，健全的民主制度才有可能在伊拉克扎根。

[参考文献]

- [1] 杨雪冬.民族国家与国家构建: 一个理论综述.[EB/OL]. [2008-05-28].
<http://www.cctb.net/zjxz/xscgk/200502240720.htm>
- [2] 宁骚. 民族与国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 [3] 约瑟夫·熊彼特.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M]. 吴良健,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
- [4] David Potter. Democratization [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7.
- [5] Francis Fukuyama. State-Building: Governance and World Order in the 21st Century [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
- [6] James Dobbins. The Beginner's Guide to Nation-building [M]. Santa Monica, CA : RAND Corporation, 2004.
- [7] Alexandra Zavis. U.S. Death Toll in Iraq Reaches 4,000 [N]. Los Angeles Times, 2008-03-24.
- [8] Michael Luo. Crisis in Housing Adds to Miseries of Iraq Mayhem [N]. The New York Times. 2006-12- 29.
- [9] James A. Baker III, Lee H. Hamilton. The Iraq Study Group Report: The Way Forward—A New Approach [R].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6.
- [10] The Benefits and the Curse of oil [J]. The Economist, 2008-08-16.
- [11] Doyle McManus. Kissinger Says Iraq Isn't Ripe for Democracy [N]. Los Angeles Times, 2006-11-19.
- [12] 黄民兴. 中东国家通史·伊拉克卷 [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
- [13] Angel M. Rabasa. The Muslim World after 9/11 [M]. Santa Monica, CA : RAND Corporation 2004.
- [14] 罗伯特·达尔. 论民主[M]. 李柏光, 林猛,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
- [15] Dankwart Rustow.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Toward a Dynamic Model [J]. Comparative Politics, 1970, 2(2).
- [16] 马克·E. 沃伦编. 民主与信任[M]. 吴辉, 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4.
- [17] Francis Fukuyama, Michael McFaul. Should Democracy Be Promoted or Demoted? [J].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Winter 2007 (8).
- [18]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After Baker-Hamilton: What to Do in Iraq [R]. Middle East Report No.60, 2006-12-19.
- [19] Henry A. Kissinger. Back to Realism [J]. New Perspective Quarterly, 2007, 24 (1).
- [20] Sarah Baxter meets Francis Fukuyama [N]. The Sunday Times, 2006-03-19.
- [21] Michael Mandelbaum. Democracy Without America [J].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07.

Three Dimensions of Understanding Political Developments In Post-war Iraq

DING Long GUO Yajuan

Abstract Iraq launched the state-building process after the war. The democratic system has been preliminarily established. However, the democratization that surpassed the stage of nation-building in Iraq hampers democratic development. Moreover, the democratic process triggered sectarian conflict and had a negative impact on nation-building. Only by promoting nation-building and achieving national reconciliation could the root causes of confessional violence be eliminated. Therefore,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Iraq's state-building and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will be secured.

Key Words Iraq; State-Building; Nation-Building; Middle East Democratization

(责任编辑: 李 意)